



穿越禁区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谢 洋

这注定是一台不同寻常的手术。病人是一个艾滋病病毒(HIV)感染合并肾功能衰竭的儿童。

很长时间里,这都是禁区。

这名10多岁的男孩非常冷静。平时病人进入手术室,护士总能第一眼从他们的眼神里感觉到恐惧或者无助,但这个小男孩的眼神里看不出什么情绪的起伏。术前打留置针时,他很听话,一点都没有动,也没有喊痛。

手术室里的陈设提前进行了整理,除了手术必须用到的仪器,房间里多余的桌椅和设备都被清理了出去。

为了减少医源性暴露的可能,一台手术平时是8名医护人员,当天也精简到6名。

虽然手术现场的人不多,但整个手术围绕着这个病人,先后有20多个医护人员在参与工作。广西人民医院移植科主任赖彦华说,第一阶段是器官捐献者去世后对其进行器官功能获取,然后要对肾脏进行修整和再评估,之后医院的影像专家、病理专家再次对肾脏质量进行评估,评估合格后,才会送到手术室。

移植的肾脏是手术几个小时前刚刚获取的。

2021年12月的某一天,广西人民医院移植科做了3台手术。当天早上,这家医院的一名患者因为意外情况不幸去世后,家属忍痛捐出他的器官。死者捐出的一对肾脏、一副肝脏帮助医院在当天成功地完成了两台肾脏移植手术、一台肝脏移植手术,其中就包括这名HIV儿童感染者的肾脏移植。

看起来,这是一次幸运的短暂的等待,事实上,这家人为了这次手术,等待了8个月。

艰难的决定

2021年年初,一对中年夫妻带着瘦弱的儿子找到广西人民医院移植科主任赖彦华。

这名出生时就不幸感染HIV的儿童,来南宁求医前,曾出现过危及生命的肺部感染。经过ICU抢救,他已经度过病情最重的阶段,达到了出院的标准。由于长期抗病毒治疗,这名患儿在肺部感染还没有完全好的同时,又被诊断出了肾病,并逐步发展到了慢性肾脏病5期(尿毒症),每个星期都需要去医院做透析治疗。

在广西,并不是每家医院都能给HIV感染者提供血液透析机位。为了活下去,这对父母要每周带着孩子从外地到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广西区内的省级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定点医院)进行3次血液透析治疗,这样的状况让他很难拥有跟同龄人一样的生活。

移植科主管护师陆敬瑶记得,她第一次接触这名患儿时,两人聊得很开心,但突然谈到学习的时候,孩子的情绪很失落,几乎要哭出来,他说有一年多没有上学了。

接受肾脏移植手术是这个孩子回归正常生活的唯一选择。



西班牙街头,人们在庆祝球赛胜利。 受访者供图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

感染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后,杨晨的嗅觉和味觉像被裹上一层保鲜膜,吞下几口“老干妈”,也没有任何感觉,味同嚼蜡。

他向女友的母亲求助。她是葡萄牙波尔图一家医院的护士。她没有提供药物和医疗方面的建议,而是给他买了一整只烤鸭,并让他多吃米饭,称“吃这个对你有好处”。

这位出生于西安的21岁中国留学生,在异国开始了独自面对奥密克戎之旅。

1

在家乡西安上了一年语言学校的网课后,2021年4月,杨晨从北京直飞西班牙,继续课程。

出发前,他接种了两针疫苗,做了核酸检测,拿到“阴性证明”。当时西班牙每天新增大约4000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杨晨落地后没遇到穿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也没人检查他的证明和疫苗接种记录。唯一的插曲是他带了两包中药丸,警察以为是毒品。

欧洲最新一轮疫情是在圣诞节后爆发的,媒体用“疫情海啸”形容奥密克戎毒株在欧洲大陆的蔓延。杨晨记得,欧洲新冠



手术现场。

来广西人民医院求医前,这对父母已经辗转几家医院咨询,均被拒绝。HIV感染患者的肾脏移植曾是绝对禁忌,因为抗排斥药物会使艾滋病病毒无法控制,现在随着抗病毒药物的发展,HIV感染者接受肾移植已经变为相对禁忌,但仍然充满挑战。

今年43岁的赖彦华,是2015年在北京301医院完成博士学位后,作为人才引进到广西人民医院组建器官移植学科的。作为学术带头人,他一直在跟进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学术动态。

早在2019年,美国马里兰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成功完成了世界上首例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之间的活体肾移植手术,这是医学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

当时,国内HIV感染者如果患有肾脏疾病不能进行肾脏移植,只能通过透析来治疗。2018年全国两会时,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朱同玉发言呼吁,要给这些病人一个做肾脏移植的机会,使HIV感染者能减少在透析治疗时传播艾滋病的机会。

2020年10月,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成功实施了上海市首例艾滋病合并尿毒症患者肾移植手术。

查阅了国内外的一些文献之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努力尝试一下。赖彦华告诉孩子的父母到医院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再制定诊疗方案。

赖彦华坦言,尽管患儿“理论上具备手术条件”,但最初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手术存在失败的风险。由于肾移植后要吃大剂量的免疫抑制剂,会让患儿的免疫力下降,如果肺部感染没有治好,反而会加重病情,危及生命。此外,HIV病毒会攻击人体免疫细胞,如果病毒复制量大的话,患儿的免疫力也将非常低下,有可能会导导致病毒进一步增

肺炎确诊病例突破1亿,一度成为新闻热点,这个数字几乎占欧洲总人口的七分之一。

平安夜,杨晨的眼睛发痒,没有红血丝,也不流泪。第二天,他的喉咙开始疼,跟辣椒吃多了的感觉很像,咽喉沫都疼。

那时,西班牙开始遭遇第六波疫情。总人口4700万的国家,累计确诊570多万新冠肺炎病例。2021年12月29日当天新增的确诊病例超过10万例,中国球迷熟悉的西甲,12月28日有31名球员被查出阳性。到1月15日,该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800万例。

元旦过后,杨晨收到当地政府的通知书,要求在室外必须戴口罩。奥密克戎传播太恐怖了,每天十几万(新增病例)。

那时,杨晨正在女朋友家做客。他的女友是葡萄牙波尔图人,曾在澳门读大学,对中国文化和美食好奇,经常让杨晨带她去中餐馆吃炒面。

女友的故乡葡萄牙也在遭遇奥密克戎侵袭。截至当地时间1月3日,葡萄牙新增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中,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的占比已经达到89.6%。到1月17日,累计新增病例已超过188万人,死亡人数接近2万,葡萄牙、西班牙和美国等国被德国列为疫情高风险地区。

一开始,杨晨觉得自己“上火”了。小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奶奶常给他吃一把黄色的黄豆,拉完肚子,症状就轻了。

他在葡萄牙没找到“黄色的黄豆”,也无法向葡萄牙朋友形容什么是“上火”。晚饭时,他开始发烧,喉咙疼到无法进食。

忍着身为护士的女友母亲的建议后,杨晨忍着疼吃下一碗米饭和几口烤鸭。

2021年12月26日晚上,杨晨的症状最强烈。睡觉时,他咳嗽、打喷嚏,咳的时候嗓子跟着疼,抽动半个胸腔,带着厚重的嗡嗡声,贼深的咳嗽,整晚地咳,还咳出了两次血,像一个病重的老人。

随之而来的是高烧。这天晚上,他在波

加,后果不堪设想。

孩子的求生欲很强,他的父母也给予了我们充分的信任。赖彦华说,他做了20年外科医生,曾主刀过上千例器官移植手术,从技术来说他还是比较有信心心的。

每名患者器官匹配的机会都是平等的

下午5点左右,手术的第一刀从男孩腹部的髂窝划下去。当髂外动脉呈现在大家面前时,手术医生更加集中了精神,因为动脉被打开后,如果操作不小心,患者的血液会从手术台喷射到天花板。

剪开血管后,大家迅速用纱布压迫出血部位,避免血飞溅出来。平时手术也会有血液沾到衣服的时候,但是那天经过我们充分的准备,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赖彦华说。

平时手术医生操作完,会拿着手术刀刀柄,直接递给器械护士。但那天手术时,他们采取了一个措施,手术医生会把用过的手术刀和缝针,放在病人大腿处的一个操作平台,之后器械护士才会去接这个器械,避免了器械直接传递导致不小心受伤的情况。

作为管理整合手术的巡回护士,覃芳香也感到那天手术室里的氛围格外安静。平常的话,可能我们还会说一些话,但那天大家的注意力都特别地集中。

很长时间里,孩子肺部感染的阴影像河流中潜藏的一块礁石,左右着这场手术的安全成败。第一次做全面评估时,孩子的肺部感染还存在,这种情况下是绝对不能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赖彦华说。

术前的几次复查,孩子肺部感染的阴影并没有完全吸收,医生建议还得再等等。等待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孩子的家属

一直很焦虑。他们担心一旦孩子肺部再次出现严重的感染,将导致失去最后手术的机会。

在赖彦华看来,孩子肺部感染的阴影,可能只是一种痕迹,我们等了几个月,发现这个病灶都没有变化,我们判断这是感染过的一种痕迹,他属于稳定状态,可以安全进行手术。

移植科主管护师陆敬瑶负责这名患儿的护理,她回忆,当时护士长告诉大家要接收这名患儿时,只是叮嘱了大家做好自我防护就可以,没什么怕的。

入院后的第十天,出现了一个血型跟患儿比较符合的成人肾源。但抽血化验的结果是抗体比较高,术后排斥反应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们没有考虑给他做。陆敬瑶回忆说,当时孩子的家长看到隔壁病房的病人陆续做手术后,很着急,常常会过来问上次都抽血了,怎么还没做手术。

赖彦华也收到过多条孩子发来的短信,“为什么今天做手术的又不是他?”赖彦华解释说,儿童器官移植的排斥风险是要大于成人的,所以对供体匹配的要求就更高。入院后的这段时间,前后出现过3次这样的机会,最终经过匹配,都不是最佳的选择。直到这个孩子入院一个多月后,一个新的肾源出现,匹配的结果非常令人满意,移植科团队下决心给他完成这次手术。

为什么能匹配成功,其实这一点还要感谢我们国家的器官分配系统对于儿童患者特殊的照顾。赖彦华强调说,因为在目前的分配系统中,儿童有优先的权利,他们匹配成功的机率要大于成人。而且在这个系统里面,不论患者是HIV感染者、乙肝感染者或是其他某种病毒感染者的,匹配的机会都是平等的。

回想起这段经历,赖彦华在朋友圈写道:评估艰难,调整艰难,等待艰难。

我感染了奥密克戎

尔图的酒店感到彻骨的寒冷,从来没感受过那种冷,无法描述,他赶紧裹上一床被子,把加热器开到最大,身体疯狂出汗,扛了一晚。

天亮后,他从女友家里找到新冠肺炎病毒自测试剂盒,5欧元(约合35元人民币)一个,类似国内的“鼻拭子”核酸检测,自己拿棒棒捅鼻孔,再放进试管,把试管里的液体滴到试纸上,大约等半个小时后,试纸上显示两条杠“阳性”。他确定感染新冠病毒了。

杨晨说,不知为什么当时突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心理,闹了两三年的疫情,亲身遇到了。

以前,每当扎堆聊天的欧洲留学生看到杨晨这张东亚面孔走来,总会有人把头转向另一边或掏出口罩戴上。

我看上去比较壮,而且不太面善。杨晨身高1.75米,身上的肌肉条块分明,初中开始练拳击,主要方向是“无限格斗”。换到其他看上去比较弱的人,或者女生,会有人跳出来命令你戴口罩,甚至说一些侮辱性的话,即使在室外不要求强制戴口罩时。

他有一些留学生朋友也感染了病毒,在朋友圈记录症状,“该来的还是来了”:第一天吃什么吐什么,吐胆汁,一天半持续低烧,浑身肌肉酸痛,站都站不稳;第二天腹泻,没完没了地咳嗽,声带暂时无法正常说话;第三天去医院检测,本来10分钟出结果的试剂直接秒出两条杠,现在看起来“算是靠免疫力扛过去了”。

对杨晨来说,病毒最恐怖的症状是流鼻涕。无色无味的水从鼻子里流出来,与鼻涕不同,一点儿都不黏稠。

我当时慌了。杨晨说,一个年轻人突然感到自己健康不行了,我想是我脑子里什么东西化了,从我鼻子里流出来。

2

杨晨从葡萄牙回到阿尔梅里亚,西

班牙南部城市,他居住的地方。当地没有国内的健康码、行程码,他在机场也没遇到人检查体温和疫苗护照。接种疫苗后,政府部门发送一个短信链接,点进去注册生成二维码即为疫苗护照。杨晨戴好口罩,如常乘坐飞机,回到租住地自我隔离。

我的天,我妈发着高烧去上班了。在杨晨离开后的第二天,女友发来消息说,她和她的母亲都开始发烧。当她的母亲还去医院上班,后来因呼吸困难住进医院,经检测确定感染奥密克戎。杨晨不清楚病毒是由他传染给女友的家人,还是女友家人传染给他的。

他没接到过公共卫生机构打来的流行病学调查电话。无论在葡萄牙还是西班牙,他不知道染上新冠病毒后应向哪个政府部门或机构报备。

根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9日,西班牙公共卫生委员会同意将新冠肺炎病毒感染病例的隔离时长从10天减少到7天,已完成疫苗接种的密切接触者无须隔离。

事实上,隔离全靠自觉。杨晨有时候会戴着口罩去购物、吃饭。我当时不想出去祸害别人。杨晨说,但我一个人在国外,不出去的话没办法买东西,挺两难。

退烧后,杨晨的体温恢复正常,但还是咳嗽、打喷嚏,嗓子疼。他喝水时,嘴里感觉奇怪。水虽然没有明显的味儿,但是人感觉出来这是水。那天就好像只喝了温吞吞的液体。

杨晨做饭时,在鸡蛋和肉中放了许多盐和调料,跑到华人超市花3.25欧元(约合人民币22元)买了一瓶老干妈,吃到嘴里依然没有味道。太绝望了。杨晨幻想着涮肉,那是他在国外最怀念的祖国美食。

他在网上搜索可以恢复味觉嗅觉的方法,大杯大杯地往肚子里灌鲜榨橙汁,但和喝水感觉不到有什么两样。

1月5日,他多次自测核酸,结果显示阴性。3天后,当他喝下一口鲜榨橙汁时,感到几滴橙汁似乎渗透了那层“保鲜膜”,

最困难的准备,最好的结果

近3个小时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晚上8点,新换上的肾脏接通患儿的髂外动脉后,血管一开放,赖彦华马上观察到新的肾脏就充盈了,大概不到10秒钟,新肾就开始分泌尿液,这说明新的肾脏开始工作了。

他的肌酐手术前大于800,术后肌酐降到了100以内,现在他的尿量已经跟正常人一样了。赖彦华说,经过肾脏移植,这名患儿可以重新自行排尿,喝水也不受限制了。

尽管第一次给HIV患者做手术,赖彦华并没有感觉跟普通的器官移植手术有多大区别。

对于这场手术,医护人员的职业暴露和安全问题并不是他首先考虑的。在他看来,器官移植科的医护人员不仅会接触到HIV感染者,平时肝移植时,遇到乙肝肝硬化患者也是司空见惯的。他首要考虑的是手术团队如何能科学地作出评估和决策,让患者安全顺利地进行这台手术。

我们做了最困难的准备,最后我们获得了一个最好的结果。赖彦华说。

从手术台上苏醒后,患儿当晚被送回了病房。见到主管护师陆敬瑶,男孩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什么时候可以喝水,我想下床走走了”。

术后指标的监测非常理想,患儿除了肌酐和尿素迅速恢复到正常水平,陆敬瑶还注意到,手术之后,他的血红蛋白值也基本没什么变化,这说明手术过程中没出什么血。

术后17天,患儿指标正常,康复出院。赖彦华用“手术顺利,恢复顺利,出院顺利”来形容这一连串的过程。他表示,目前患儿只是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治疗,度过了手术和急性排斥的危险期,近期风险还包括慢性排斥和感染,因为现在吃的排斥药会导致免疫力下降,有可能会导导致机会性感染,还要长期进行随访监测。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0月底,全国报告现存HIV感染者114万例,我国艾滋病疫情总体控制在低流行水平。

国家对艾滋病的治疗目标已从让患者“生存下去”转变为“正常的有尊严的生活”,HIV感染者可以达到和健康人群一样的预期寿命。

大家都很熟悉艾滋病感染,但并不知道艾滋病感染的病人中,有30%的人会出现艾滋病病毒相关的肾病。赖彦华表示。

具体到这名患儿,尿毒症还导致他出现肾性骨病,他的生长发育是停滞的。由于个头明显比同龄人矮小,影响他在学校跟同学的正常交流,心理健康受到影响。

器官移植的目的,一是要让患者能存活下来,更重要的是提高他的生活质量。如果器官移植手术做成功了,那他的生长发育会追赶上来,有助于他回归学校、回归社会。赖彦华说。

成功完成国内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儿童肾脏移植手术,赖彦华说:我们从观念上突破了过去不能给艾滋病感染者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禁忌,这种突破已经超越了技术本身。

3

他的嘴里突然有了味道,他的味觉、嗅觉又突然回来了。

杨晨感觉完全恢复了。1月6日,他骑着摩托车自驾1200多公里,从西班牙到葡萄牙。因为要穿越边境,他担心会遭遇检查,出发前到检测机构拿到了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结果到了西葡边境,发现检查站是空的。

他看到新闻,西班牙领导人在1月12日向欧盟提出建议,敦促欧盟同样就“像对待流感一样对待新冠病毒的可能性”进行辩论,此举将取消封锁和每日感染病例的计数。

这如果放在国内,可能不敢想象。杨晨说。他拍摄的当地年轻人聚会的视频里,几乎看不到戴口罩的人。

杨晨的一位法国好友“誓死不打疫苗”,他辞掉了厨师的工作,从巴黎自驾10个小时跑到图卢兹,躲进100多公里外的深山老林,靠交易比特币谋生。

去年9月份,杨晨骑着摩托车到深山里看望他。那里有电,手机网络断断续续,跟人发消息都得打着字发。

真的很夸张,我俩一天就是吃饭、锻炼、睡觉,看不到其他人。杨晨待了一周,只穿着一条内裤在山上骑摩托。而那位法国朋友,目前还不是一个人在山里独居。

我其实也搞不懂这些人的思想。杨晨说,如果他认为疫苗可能伤身,但他们平时饮酒抽烟,也并非是在特别在意身体的那种人。

杨晨希望欧洲疫情尽快结束,这样他的朋友可以回到城市工作、生活。他也希望家乡西安的疫情能尽快缓解,他所有的亲人都在那里,他打算夏天带着葡萄牙女朋友回去。

最近,杨晨听说,法国又出现了IHU一种新型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他的信心失掉了大半。

(应受访者要求,杨晨为化名)

9

1月15日,南太平洋岛国汤加海底的火山发生剧烈喷发。卫星照片显示,火山喷发的瞬间,一个巨大的灰色蘑菇云升起于太平洋上空。汤加最大的城市努库阿洛法,天空变成了黑色,火山灰和卵石如雨点般地落在汽车上,人们逃离城市,去往高处,长长的车龙蜿蜒穿过公路。

此次灾难带给汤加的忧虑是多方面的。有外媒报道称,汤加的水资源和空气可能受到火山灰的严重污染,建议人们尽快戴上防毒面具。汤加驻澳大利亚外交官说,汤加担心救援人员将新冠肺炎疫情带到这个没有新冠病毒的南太平洋岛屿。海潮退去之后,迎接汤加的是否会是一波新冠肺炎疫情浪潮?人们不得而知。

火山爆发那一刻,在距离汤加650公里外的斐济可以听到回响。一些人说,他们把这种声音误认为是雷声,或者是自己国家的某座火山喷发,并且感觉建筑物摇晃了几个小时。

紧接着,海啸袭来。高达1.2米的海浪被冲上汤加的海岸,在一则视频中,大水在建筑四周翻涌,穿过城市的街道,撞向了一个满是人的教堂。

距外媒报道,在距离汤加2300公里外的新西兰,火山爆发时居民Mere Taufā一家正在准备晚饭,而她的弟弟以为附近有炸弹爆炸。我第一反应是躲到桌底,我抓住我妹妹,大叫我爸妈和家里的其他人都躲起来。随即她就发现,海水涌进了家里。你只听见周围都是尖叫,人们大叫逃命,叫所有人去往高地。她说。

据路透社报道,1月18日,汤加首例死亡被确认。一位名叫Angela Glover的英国女子在海啸中丧生。但截至目前,此次事故仍未有官方伤亡人数报告,具体的破坏情况也是未知数。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近10万汤加人正在不安与焦虑中等待着失联亲人的消息。据英国《卫报》等报道,一位家属无比担心居住在汤加的叔叔。他年事已高,且双腿残疾。火山爆发的那天晚上,侄女彻夜无眠,她打开了在线广播,希望能等到一点关于汤加的消息。这是源自新西兰的守夜活动,他们说,我们要祈祷,播放音乐,等待,那天每个人都在网上一齐等待,直到深夜。她说。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预估,汤加国可能有多达8万人受到了此次灾难的影响。

此次火山喷发到底有多强烈?据自媒体“中国气象爱好者”分析,此次汤加火山喷发的强度可能达到了VEI5级的上端,甚至有可能达到VEI6级(VEI,火山爆发强度指数),相当于8.7级至9.3级地震所释放出的能量。美国《国家地理》称,在人类的时间尺度上,这次火山喷发的剧烈程度是相當罕见的,其喷发频率大约是1000年一次。

地球科学研究者李蔚然强调,火山喷发的VEI指数只有当喷发结束后或接近尾声时才能确定,而目前,汤加火山的喷发似乎并没有停下来的趋势。

当然,也有一些充满希望的消息传来。新西兰驻汤加高级代理专员彼得·隆德在社交平台写道:虽然首都努库阿洛法的海滨遭受了重创,但当我们开车经过时发现,多数建筑物仍屹立不倒。许多人已经回到家与家人待在一起,供电也在逐步恢复。

中国外交部表示,驻汤加使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目前未有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监测结果分析,火山喷发未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影响。

然而,喷发引起的海啸波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秘鲁、美国、日本等国,给数以亿计的民众带去了灾难。据外媒报道,在秘鲁,两个人因异常海浪而丧生;新西兰的一些船民说自己没有接到预警,停在岸边的船只被海啸击碎;而在日本,岩手、宫城、鹿儿岛等8个县约23万人需要紧急避难。

这座不安分的火山有个名字,在汤加语中,就是“火山喷发”的意思。据地球科学研究者李蔚然的科普,20世纪以来,这里发生过4次记录在册的喷发,但并未引起特别大的灾害。坐落于这座巨大的海底火山之上,汤加就像被放在山口处的一粒小石子,静静地等待着自己未知的命运。